

正史艺文志补撰初探

李永忠

我国历史上的二十四部正史中有艺文志者仅六部，清前期兴起了正史艺文志补撰之风，迄今为止的三百余年间共产生补正史艺文志六十余种，其中现存四十余种。这些补志丰富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内容，它们和原有的正史艺文志成为整理传统文化遗产、研究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书目工具之一；正史艺文志补撰过程中所总结和积累的文献整序方法对于当前的书目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整理和研究补正史艺文志、对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给予恰当的评价就成为中国文化史、尤其是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民国以来，许多目录学研究者如梁启超、王重民等均对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有所论述，但就补撰缘起、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如何整理补志使之便于检索等均需深入探讨。

通常所说的正史艺文志补撰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原无艺文志的正史补撰艺文志；二是对原有的正史艺文志进行续补；三是对原有的正史艺文志进行研究。本文只论述补撰和续补中的一些问题。

一、正史艺文志补撰缘起

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兴起于清朝前期，其缘由是多方面的。

1. 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

苦心经营，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顶峰。由于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成熟，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了全面总结中国古典文化的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往往有一种从总体上把握古典文化的意向，目录学家也不例外，这一点在他们的书目著作中表现的十分突出。清代的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史志书目、还是私家书目“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①正史艺文志作为我国古代书目体系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源远流长，而且向以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为历代学者所称道。它可以指明学术的大纲、著述的源流、读书的门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编纂者学识和观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正史艺文志存在的问题很多，其中尤以缺略最为突出，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大部分正史无艺文志，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和辽金元时期；二是原有的正史艺文志疏漏颇多，如《汉书·艺文志》忽略了《七略》到王莽亡国三十年间的著述，《隋书·经籍志》重南而略北等。正史艺文志的缺略和当时全面总结古典文化的需求形成了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就成了当务之急。此外清前期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对正史艺文志的价值和作用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金榜甚至指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②他们对正史艺文志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促进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开展的作用。

2.在学术研究方面，清代学者力矫明代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大力提倡博闻尊古、回归原典，无论是经学研究、史学研究还是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均贯穿着一种博洽和务实的精神，并且在学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颇为严密的研究方法即考证方法。考证要求博览贯通，立论、驳论均须有可靠的证据，这种博赡和综核的要求对正史艺文志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希望正史艺文志能提供更多的考证资料的线索，能发挥更加有效的学术工具的作用。

同时，学者们重视文献的研究，对历代重要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辨伪工作，使后人对古典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这也为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考证方法成为进一步完善正史艺文志、进行正史艺文志补撰的有效方法。

3.我国古典文献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散佚十分严重，“自秦火以后，迄于隋唐，历代收藏，几经五厄，故以《汉志》著录之书求之《隋志》而十缺二、三，《隋志》著录之书，求之《唐志》而十无七、八”。^③这种情况使后人难以阐述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同时也使后人难以把握古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面目。清初，辑佚之学大兴，汉学巨擘惠栋首先搜集古经、古注，成《九经古义》十六卷，其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诂》三十卷。《四库全书》的前期工作主要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共裒辑佚书达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开官府辑佚的先河，对清代辑佚工作影响很大。辑佚与书目特别是正史艺文志具有密切的关系，“辑书非易事也，非通校仇、精目录，则讹舛百出。”^④起初，辑佚家多借助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正史艺文志作为辑佚的指南，随着辑佚工作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原有的正史艺文志难以适应辑佚的需要，正史艺文志补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4.明末清初，藏书之风大兴，为正史艺文志补撰创造了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明末，私家藏书楼开始大量涌现，出现了名甲天下，藏书之富可比皇家的私人藏书楼，如范钦的天一阁、毛晋的汲古阁。清初，藏书事业更是盛极一时，大江南北藏书楼琳琅相望，“浙东西有静惕、潜采、云在、道古、小山、振绮、瓶花、开万、寿松、知不足、拜经、向山、蜨隐、汉唐、文瑞；吴会有朴学、红豆、桂宦、小玲珑、来雨、陶庐、滋兰、稽瑞、爱日；河北则有沽水、梧门、万卷、笥河、宝苏、南涧”。政

府藏书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如《四库全书》修成之后所建的南北七阁。丰富的藏书为正史艺文志补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此外，藏书家们往往把正史艺文志作为访书、校书的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产生和发展。

5.《明史·艺文志》的纂修直接引发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产生。《明志》是正史艺文志中纂修时间最长、变化最多、花费气力最大的一部，明末即有修明艺文志之举，入清以后用了近半个世纪、数易其稿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志》。正史艺文志发展到清代不能不有所变革，这是艺文志本身的特点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正史艺文志的纂修历来是以官修书目为底本以记一代藏书之盛的，明朝于1380年废除了收集和整理文献的机构秘书监；明历代政府的藏书数量不多且储藏较为分散，故尔明代没有能够编出一部质量很好的官修书目，因此使《明史·艺文志》的纂修失去了凭籍，而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图书出版事业盛况空前，文化典籍的积累超出前代数倍不止，这样明艺文志如果再记一代藏书之盛就无法与正史相匹配，然而修志者们仍习惯于《隋志》兼补五代的做法，焦竑、傅维麟、金门诏等莫不如此，所以他们所编制的明艺文志最终限于正史的篇幅而不被采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综上所述，正史艺文志产生的缘由是多方面的。目录之学在于致用，在清代这种全面总结和整理古典文化，特别是考证学在学术思潮中起主导作用的环境之中，古代书目中最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正史艺文志不能不适应学术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为当时的学术文化服务。《明史·艺文志》纂修中出现的矛盾以及以记一代著述方式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只不过是正史艺文志产生的外在原因。正史艺文志补撰代表了正史艺文志发展的新方向，由此也使正史艺文志得到了全面的整理和进一步的完善。

二、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发展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

综观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补正史艺文志的质量和正史艺文志补撰方法的演变，我们大致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清康熙初年到嘉庆时期为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阶段；清道光至宣统时期为正史艺文志补撰的鼎盛阶段；民国以来为正史艺文志补撰的余绪阶段。

1. 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

清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馆成立前后，正史艺文志补撰拉开了序幕，这一阶段产生的补正史艺文志有十余种。首先值得一提的有黄虞稷所修的《明史艺文志稿》。康熙十八年（1679）设明史馆纂修《明史》，黄虞稷（1629—1691）被荐参与纂修《明史》列传及艺文志。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黄氏编成了《明史艺文志稿》，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重点收录了明代人物的著述，鉴于“《元史》既无艺文，《宋志》咸淳以后多缺”^⑥的情况，又补录了宋辽金元各代的著述，虽然他仍遵循“晋隋史志兼补五代之遗则”，可是，宋辽金元的著述在其《明史艺文志稿》中是以“附”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已经成为半独立性质的补正史艺文志了。王鸿绪、张廷玉除了删去黄氏《明史艺文志稿》中宋辽金元著述以外，基本上采用了黄氏志稿，这样《明志》就成为纪一代著述的艺文志了。删去宋辽金元著述和《明志》纪一代著述实际上引发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

这一阶段的补正史艺文志主要有：徐炯（约1661—1731）《补五代史记艺文考》三卷、金门诏（1673—1752）《补三史艺文志》一卷、厉鹗（1692—1752）《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杭世骏（1695—1772）《金史补艺文志》、钱大昕（1728—1804）《元史艺文志》四卷、钱大昭（1744—1813）《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或作二卷）、陈鱣（1753—1817）《续唐书艺文志》一卷，

其它的如：黄虞稷原著、卢文弨（1717—1796）校正《宋史艺文志》一卷、《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吴騫（1733—1813）校补《四朝经籍志补》，厉鹗《后汉艺文志》（已佚），张锦筠《元史艺文志补》，朱文藻（1735—1806）《宋史艺文志》，杨复吉（1747—1820）《辽史拾遗补经籍拾遗补》一卷，洪飴孙（1773—1816）《补后汉艺文志》（已佚），劳颢《订补续汉书艺文志》（已佚）。

这一阶段正史艺文志补撰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范围看，主要集中于宋辽金元各正史艺文志的补撰，例如专补辽史艺文志的有厉鹗、杨复吉两家，兼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的有黄虞稷、金门诏、卢文弨、吴騫、钱大昕四家，基本上解决了《宋志》缺略、辽金元三代无正史艺文志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些补撰者跳出了宋辽金元的范围，如徐炯、陈鱣、厉鹗、钱大昭等，其中尤以厉、钱二位对《后汉书》艺文志的补撰影响最大，他们拓宽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范围，使后人认识到凡是没有艺文志的正史都可以通过补撰达到重建一代艺文的目的。

（2）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方法看，除了继承以往目录学的方法外，主要采用一些经验性的方法，因此这一阶段的补正史艺文志多注重辑佚，如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取蔚宗本史所载及出之见存于今代、引证于古书、著录于别史既藏书所录者辑为此编，以补司马氏之缺漏”。^⑦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也是根据所见元明诸家文集、志乘小说及各家书目而辑成的。这一阶段的许多补撰者均为当时的经史考订专家，但他们并没有在正史艺文志补撰方面运用考证方法，例如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是根据各家书目辑成的，但对其中的错误并未加考证和纠谬。十余种补正史艺文志中，只有徐炯《补五代史记艺文考》对所补文献的根据略加考证。

(3) 从补正史艺文志的体例上看,著录项目不太齐全,只有少部分补正史艺文志注明材料出处,图书存佚情况的说明也不甚详细。大部分补志采用小注,对所著录文献的名称、责任者、卷数等加以简明扼要的说明和揭示。分类体系大多参照《隋志》的四部分类法,有的略加变动,其中劳颢在《订补续汉书艺文志》序中认为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采用四部分类法部次后汉著述是欠妥的,因为四部之名起于东晋,东汉时尚无四部分类法,因而劳氏在他的补志中改用《七略》的分类体系。

(4) 这一阶段的补正史艺文志普遍说来断限不严格。断限是影响补志收录范围的主要因素,断限不严就会出现误收现象,如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虽为《元史》补艺文志,其中也收录了辽金元著述,这样就会导致误解,影响补志的利用。大部分补撰者没有认识到断限在正史艺文志补撰中的意义和作用,只有劳颢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并在其补志中删去了钱大昭误收的彭宣《易传》、孙炎《尔雅注》等。

2. 正史艺文志补撰的鼎盛

正史艺文志补撰到清道光年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补撰者运用以往所有整理文献的材料,特别是乾嘉学者整理古典文献的成果和方法,把正史艺文志补撰推上了高峰,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正史艺文志补撰派,在清代目录学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从道光年间到清朝灭亡的九十余年中产生了近三十种补正史艺文志,主要有:侯康(1798—1837)《补后汉艺文志》四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顾槐三(1785—?)《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汪之昌(1837—1895)《补南唐艺文志》一卷,丁国钧(?—1919)《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一卷,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四卷,秦荣光(1841—1904)《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曾朴

(1872—1935)《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吴士鉴(1868—1933)《补晋书经籍志》四卷，张鹏一(约1864—1934)《隋书经籍志补》，缪荃孙(1844—1919)《辽艺文志》一卷，褚德仪撰、王仁俊(1866—1913)补《补宋书艺文志》、《补梁书艺文志》，王仁俊(1866—1913)《西夏艺文志》一卷、《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另有徐鼐(1810—1862)《明史艺文志补遗》(未见)，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艺文志》(已佚)，汤诒名《补梁书艺文志》、《补陈书艺文志》(未见)，陶宪曾《补侯康后汉书艺文志补》、《补侯康三国艺文志补》，王荣兰《宋艺文志补遗》(未见)，姚振宗(1842—1906)《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郑文焯(1856—1918)《金史补艺文志》四卷(未见)，黎世衡、董康鉴定、高桂华等辑《补南书艺文志》等。

这一阶段的正史艺文志补撰呈现出以下特点：

(1) 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范围看，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而且一些正史出现了多家并补的局面，如补后汉书艺文志的有五家，补三国艺文志的有三家，补晋书艺文志的四家。有的补撰者对原有的正史艺文志也开始进行续补的工作了，如徐鼐的《明史艺文志补遗》、张鹏一的《隋书经籍志补》、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

(2) 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方法上看，这一阶段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以往目录学的方法，如丁国钧在其《补晋书艺文志》中运用了互著的方法等，而且辑佚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更加普遍和熟练地运用于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中了。许多补撰者既从事过专门的辑佚工作，又受过严格的经史考订之学的训练，他们能够而且也把清代辑佚和考证的成果和方法充分运用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实践当中。支伟成在提及顾槐三《补后汉艺文志》时云：“既逐条

疏其出处，而如《诗》小序、《书》古文，郑、贾、服诸儒所撰莘莘大者，辨证加详，凡群书佚文有可考者，亦复辑佚无遗。”^⑧这段话明确地道出了补撰者在正史艺文志补撰过程中搜罗之广、考证之精、用力之深的真实情况。

(3) 从补正史艺文志的体例上看，这一阶段的补正史艺文志著录项目比较齐全、准确和一致，尤其是能够注明所辑材料的出处及文献的存佚情况。大部分补正史艺文志采用辑录体提要，对文献的题名、卷数、责任者、内容、价值及影响等情况予以比较充分地揭示，对一些各种材料记载相左的文献则加案语，详为考证并陈述己见。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都有助于大大提高正史艺文志的学术水平及使用价值。

(4) 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补撰者对补正史艺文志的断限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们对前代补正史艺文志因断限不严导致误收的现象进行批评，并在自己的补志序例中强调断限问题，对正史艺文志的收录范围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这些都使得补正史艺文志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纪一代著述的书目。但是，由于历史现象的纷繁复杂，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界限常常犬牙交错，颇难划分得泾渭分明，故尔无论是主张“断代著述首严弃取”^⑨的人还是那些认为补志是辅翼原有之正史的、断限应与原正史一致的人，都没能做到严于弃取，只是一些补志相对好一些、严格一些罢了。

3. 正史艺文志补撰的余绪

民国以来的补志有二十种，主要有黄逢元（1863—1925）《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四卷、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聂崇岐（1903—1962）《补宋书艺文志》等，另有李正奋《隋代艺文志》、《补后魏书艺文志》，孙德谦（1869—1935）《金史艺文略》，刘纪泽（1900—1960）《宋史艺文志甄补》（毁于战火），万曼（1903—1971）《金史

艺文志》，蒙传铭《北齐书艺文志》，杨寿彭《陈书艺文志》，赖炎元《魏书艺文志》，王忠林《周书艺文志》，李云光《梁书艺文志》等。

这一阶段正史艺文志补撰表现出如下特点：正史艺文志补撰主要集中于南北朝各正史，也即补撰者集中对纪一代藏书之盛的《隋书经籍志》进行了改编和续补，使之形成了多种断代艺文志；正史艺文志补撰方法没有新的突破，只是有一些补撰者能利用最新资料，使补正史艺文志收录更加齐全，如聂鸿音《西夏艺文志》，利用了国外书目资料中关于西夏文献的信息；补撰者不但吸收了前代正史艺文志补撰的经验，并且能利用书目工作的最新成果，这样就使这一阶段的补正史艺文志的书目结构更加明晰，著录项目更加完备、著录款目一目了然。

三、正史艺文志补撰评价

1. 正史艺文志补撰的成就

(1) 正史艺文志补撰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言简意赅的断代学术史纲。“史志经籍、学术攸关”，补撰者把补正史艺文志视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在正史艺文志补撰中始终注重发挥书目辅助学术研究的功能。从补正史艺文志中，我们既可以发现补撰者的学术思想，又能对某一时代的学术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补正史艺文志不但记录存于当世的图书，而且记录已佚的图书以及金石、碑刻等非书资料；不但记录为历代所重视的经史典籍，而且大量收录原来被正统的封建学者斥为“奇技淫巧”的图书，如释道、戏曲、小说、食货等方面的图书。所有这些都全面地反映了一代学术概貌，极大地拓宽了史料的范围，为我们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书目工具。补正史艺文志的辑录体提要对了解一部文献乃至于一代学术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之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是清代学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一部文献以及一代学术的理解，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常常合诸家评鹭来判定文献的价值，但归根结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提要撰写者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补正史艺文志却尽可能汇集自古至今对一部文献及其责任者的评论，这样就为我们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一部文献奠定了基础。尽管补正史艺文志所采用的分类体系大多没有超出四部分类法，但许多补撰者都能本着因书设类的原则，对文献进行部次条别。如补辽金元艺文志各家均在经部设“译语”一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翻译史颇具价值。通过对补正史艺文志类例的分析，特别是采用文献统计分析法就可以窥见某一学科的沿革情况，可以把握一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学风的演变，一代学术的地域分布、学海派分渊汇等情况。总之，一个个补正史艺文志都可以视为言简意赅的学术史纲。

(2) 正史艺文志补撰过程中整理和保存了有关我国古代文化的许多珍贵史料，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补撰者本着保存中国古典文化的目的从事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他们从浩繁的各种历史记载中披沙拣金，这种对我国古典文化热爱至深的精神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正史艺文志及补正史艺文志是保存中国文化典籍最完备的书目资料。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历代官修书目存者不多，私家书目及专题书目记载的某一时期某一藏书家的藏书或某一时期某一学科专题的著述，这样，我们如果从整体上把握古典文化、学术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文化典籍的基本情况就显得十分不易。正史艺文志补撰者则从极其广泛的资料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关于一代文献的记录，虽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确实或未完成的文献，却使我们从宏观上认识整个古代文化典籍的概貌，如某一时代，某类文献开始出现，某类文献在何时刊行的最多，何时散佚的最严重，通过对补正史艺文志进行分析即可了解这些基本情况。补撰者往往在其补志的序

言或正文中对某一时代文化发展的情况，如政府访书、藏书及整理的情况加以叙述，或者对这一时代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特殊贡献以及对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加以评说，如果我们把补撰者袁集起来的这些珍贵史料加以集中，必将有助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历代史书多‘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学术文化发展之一斑。”^⑩

(3) 正史艺文志补撰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宋代目录学家郑樵的毕生理想就是编纂一部通录古今的书目，他认为此书目应“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他的《通志·艺文略》即其理想的具体体现，然而《通志·艺文略》远远没有将古今之书网罗殆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这个理想是由正史艺文志补撰者经过三个世纪的辛勤努力而基本上得以实现，补正史艺文志和原有的正史艺文志连接起来形成了一部汉代至清代的系统、完整的图书总目录，达到了郑樵所提出的要求。正史艺文志补撰者运用辑佚的方法重建一代艺文，运用考证的方法使补正史艺文志具备了更高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古典目录学中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使史志目录发展成为中国古典书目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书目工作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方法。正史艺文志补撰丰富和完善了文献揭示方法，小注和互著法的灵活使用，搜罗广博、内容丰富的辑录体提要的编制等，这些在现代书目编制工作中都是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2. 正史艺文志补撰存在的问题

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是处在没有组织协调的情况下由补撰者独立进行的，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补撰者本身的学识水平及其所处社会条件的限制，正史艺文志补撰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前人，但对前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对于我们继承和利用他们留下的这部分

宝贵遗产是大有裨益的。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历史过程和补正史艺文志的总体情况看，正史艺文志补撰存在着以下问题：

(1) 补正史艺文志之间、补正史艺文志与原正史艺文志之间相互重复现象严重。

由于封建社会学术信息交流甚少、文献流传不广等原因，正史艺文志补撰中的重复现象严重。表现为：多家并补一志，虽然各有所长，但造成了各补正史艺文志之间的相互重叠，如补辽金元史艺文志者达十余种，其中有的单补一朝，有的兼补三代。后补者总是在综录前代补志的基础上增加自己认为应当增加的文献，这样就免不了重复；各时代的补正史艺文志之间也因断限不严而重复收录一些文献，如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上及西汉，下包三国，类例既极草率而不免误收”^⑩；原有的正史艺文志与续补艺文志之间的重复也颇多，《隋书经籍志》纪一代藏书，补撰者将其改编为一个个纪一代著述的艺文志，这种改编有利于了解一代著述以及学术文化，同时也出现了重复收录的现象，如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共著录图书一千二百三十二种，其中与《隋书经籍志》重复收录的达四百三十二种。

(2) 补正史艺文志的著录内容和著录格式很不统一。

著录直接体现书目的易读性和书目的质量。许多补正史艺文志的著录项目很不完备，所收图书的卷数及存佚情况的说明项付之缺如。著录格式也五花八门，有的以题名为标目，有的以责任者为标目，甚至有的在责任者标目前加官衔、学衔、爵里等。即使补同一正史的艺文志，其著录内容和著录格式的差别也很大。

(3) 补正史艺文志的分类体系不统一。

补正史艺文志大部分采用四部分类法，只有少数采用七分法。即使是采用四部分类法，各补正史艺文志在二级类目的设置和类名的选择上也是大小不相同的，随意性比较大。如侯康、顾槐三、姚振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的史部：侯志分为十一类、

顾志分为十类、姚志分为十五类、曾志分为五类，且其类目的设置和类名完全一致的很少。分类体系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归类的不一致。如果不熟悉各自的分类体系以及各个类目的含义，翻阅、查检起来显得十分困难。

(4) 补正史艺文志因考校不精而导致的错谬不少。

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约略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题名错误、人名错误、归类错误。中国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其名称变化司空见惯，有的用别名，有的简化原名，如果校勘不精就会导致错误，另一方面，补志是以各家著录为依据的，各家著录有题名不同的，有卷数互异的，后人因之，一文献分为二种，此外唐宋以后的类书所徵引，或简写题名，或单举篇目，如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据《隋志》著录了《汉书叙传》，又据《文选》李善注著录了《汉书音义》，其实是一部文献。中国古代的人名也十分复杂，有名、字号、别名、别称等，补志者如不加详细考证就容易出错，如陈普，一名尚德，黄虞稷原著、卢文弨校补《补辽金元艺文志》中既著录了陈普，又著录了陈尚德，将一人当作二人，其著作自然也不能集中于一人之下。归类不当的现象在补志中比比皆是，因为正史艺文志补撰是根据二手资料重建一代艺文的，其中许多文献是据其名称归类的，尤其是那些久佚而无辑本的文献。

(5) 补正史艺文志的检索功能比较差。

不重视检索功能是中国古代书目的通病，补志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在那些多家并补一志的情况下，如果从中查出某一文献或者某一责任者的著述情况，除了一一翻检似乎别无良策，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补志的使用价值。

总之，补志存在着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故补志只有加以认真的整理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使其更好地为宏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3.关于整理补志的建议

整理补志的工作始于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之后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张寿荣重刊的《八史经籍志》、王伯祥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等均对补志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整理，但从便于使用和检索的角度对补志加以整理的当属聂崇岐编纂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二年整理出版的《十史艺文经籍志》。但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补志中存在的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整理补志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利用各种线索把迄今为止出现的补志收集齐全，然后将补同一正史的艺文志集中起来，对各自的优劣加以比较、分析和研究，从中选定一种质量较高的作为底本，用其它补志加以补充，删去重复，定为一编。原有的正史艺文志和续补志的整理有两种办法，可以以原志为底本，用补志来补充，也可以以其中较好的补志为底本，用原志加以补充，将其改编为纪一代著述的艺文志。

(2) 参酌各家补志，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对补志著录的文献进一步考证，使著录内容更加准确、完备；著录格式采用《古籍著录规则》，对各补志定本加以标准化著录，并输入电子计算机，形成关于我国古籍流传、存佚的书目数据库。

(3) 补志的分类体系可采用目前通行、适用的四部分类法。根据各家类分文献的情况，运用折衷的办法将补志所著录的文献归入四部分类体系中，使其便于从分类途径查考和研究。

(4) 对补志中的题名、责任者、内容等方面的疑问考证明确，并予以说明；改正补志中存在的著录、分类等方面的错误；增加补志的检索途径，编制题名、责任者、主题索引，提高其检索功能。

总之，补志的整理是一项必要且又相当繁琐的工作，需要我

们做出艰苦的努力，聚沙成塔，人成一志，其有功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 ①来新夏·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历史研究，1981，（2）
-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22·汉艺文志考证。
- ③陈中凡·古书校读法·商务印书馆，1923。
- ④刘咸炘·目录学·上编，民国廿五年成都茹古书局刊本。
- ⑤（日）岛田翰·丽宋楼藏书源流考，清光绪丁未武进董氏北京刊本。
- ⑥倪灿·明史艺文志稿序·二十五史补编。
- ⑦邵晋涵·补续汉书艺文志·序。
- 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顾槐三传·泰东书局，1925。
- ⑨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序·二十五史补编。
- ⑩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9.4.8，（3）。
- ⑪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师石山房丛书。

作者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